

Albert Schweitzer



文化哲学

Kultur und Ethik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 著 陈泽环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Albert Schweitzer

文化哲学

Kultur und Ethik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 著 陈泽环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哲学/(法)阿尔贝特·施韦泽
(Albert Schweitzer)著;陈泽环译.—3版.—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262-6

I. ①文…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文化哲学-研究 IV. ①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9884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张志全工作室

文化哲学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 著
陈泽环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5 插页 4 字数 311,000

2017 年 2 月第 3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62-6/B·1240

定价 60.00 元

目录

前言 阿尔伯特·施韦泽自述 / 1

第一卷 文化的衰落与重建 / 41

前言 / 45

- 1 哲学对文化衰落的责任 / 46
- 2 我们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文化障碍 / 52
- 3 文化的伦理本质 / 61
- 4 文化的再生之路 / 75
- 5 文化与世界观 / 84

第二卷 文化和伦理 / 97

前言 / 101

- 1 文化危机及其精神原因 / 113
- 2 乐观主义世界观问题 / 120
- 3 伦理问题 / 126
- 4 宗教与哲学世界观 / 133
- 5 希腊—罗马哲学中的伦理和文化 / 137
- 6 文艺复兴与后文艺复兴时代的乐观主义世界观与伦理 / 161
- 7 17 与 18 世纪的伦理论证 / 168

文化哲学

- 8 理性主义时代的文化奠基 / 183
- 9 康德的乐观主义—伦理世界观 / 194
- 10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与世界观 / 202
- 11 费希特的乐观主义—伦理世界观 / 210
- 12 席勒·歌德·施莱尔马赫 / 219
- 13 黑格尔的超伦理乐观主义世界观 / 223
- 14 晚期功利主义，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伦理学 / 230
- 15 叔本华和尼采 / 242
- 16 西方探寻世界观努力的终结 / 255
- 17 新路 / 273
- 18 出于生命意志的乐观主义论证 / 279
- 19 以伦理学史为基础的伦理问题 / 286
- 20 奉献伦理和自我完善的伦理 / 295
- 21 敬畏生命的伦理 / 305
- 22 敬畏生命伦理的文化动能 / 323
- 后记 / 335
- 人名和术语表 / 341
- 译者后记：文化和世界观 / 351

前言 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

我于 1875 年 1 月 14 日生于上阿尔萨斯的凯泽斯贝格，是我当代管牧师的父亲路德维希·施韦泽的第二个孩子。当时，我父亲在那里的一个新教占少数的小教区里服务。我的父系祖先通常是乡村教师或管风琴师，我的父亲则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个神学家。我的母亲阿德勒，娘家姓席林格尔，是阿尔萨斯明斯特塔尔地区米尔巴赫的牧师的女儿。

在我出生几个月后，我的父亲前往明斯特塔尔的京斯巴赫就任圣职。我在那里度过了非常幸福的童年时代，只是我父亲经常生病才给它带来了些阴影。

直至 1884 年秋，我一直在那里的乡村小学读书；然后，我在明斯特读了一年实科中学。1885 年秋，我转读阿尔萨斯米尔豪森的文理中学。我的教父和叔祖父路易斯·施韦泽是那里的公立小学校长，他有意照管我。当然，由于我们家有 5 个孩子，我父亲几乎没有可能送我到文理中学读书。

我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叙述了我离开文理中学之前的经历。

在乡村小学和实科中学中，我只能算是一个“跟得上”的学生；而在文理中学里，开始时我则成了一个坏学生。这不仅是由于我的懒散和梦幻，而且也由于即使通过补课，我的拉丁文仍然达不到已经开始的二年级的要求。只是在三年级时，班主任维曼姆博士指导我正确地学习，提高了我的自信心，情况才开始好转。

我的音乐老师是欧根·明希，他是米尔豪森新教圣斯特凡教堂年轻的管风琴师。明希不久前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那里正不断升温的巴赫热深深吸引着他。我很早就了解巴赫的作品，并从 15 岁起就能有幸受到扎实的管风琴课程的教育，都归功于他。

1898 年秋，当欧根·明希在他的盛年死于伤寒时，我把他的一张照片

片附在一本小册子中。这本小册子在米尔豪森出版，也许是我的第一本出版物。（《欧根·明希》，共28页，布林克曼出版社1898年，阿尔萨斯的米尔豪森，法文。）

在文理中学中，我的兴趣主要在历史和自然科学。历史课老师是布雷斯劳著名历史学家的兄弟考夫曼博士。弗尔斯特博士的自然科学课也非常好。

但在数学和语言课程中，我得努力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激励自己掌握那些对我来说的弱项。这样，到了高年级时，即使不算是最好的话，我也是一个较好的学生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时我的作文经常是第一名。

毕业班时，我们有一个杰出的校长威廉·德克。他是吕贝克人，教拉丁文和希腊文。他教学时，不像一个枯燥的古典语言学家，而是让我们熟悉古典哲学，同时也让我们了解近代的思想。他是叔本华的热情追随者。

1893年6月18日，我通过了毕业考试。我的书面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甚至作文成绩也是如此。但是，在关于历史知识和判断的口头考试中，我引起了考试委员会主席的注意，他是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高级学监阿尔布雷希特博士。他给我的历史考试以好评，并提议给我“优”的成绩。这样，我的其他成绩相当一般的毕业证书就显得好看了点。

这一年的10月，居住在巴黎的伯父慷慨地帮助了我，使我能够到巴黎的管风琴大师夏尔·马里耶·维多尔那里上管风琴课。米尔豪森的明希老师教得我很好，以至于在听了我的弹奏之后，维多尔就收下了我这个学生。通常，他只教巴黎音乐学院管风琴班的学生。他的授课对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维多尔指导我提高技巧，注意完善演奏的表现力。同时，他还使我认识到音乐作品结构的重要性。

1893年10月底，我进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我住在圣托马斯教堂的神学研究所，它的领导是有学问的牧师阿尔弗雷德·埃里松。那时，他正在编校加尔文的著作集。

当时，斯特拉斯堡大学正处于它的全盛时期。没有传统的阻碍，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实现近代高校的理想。几乎没有上了年纪的老师。整个大学洋溢着青春气息。

我同时在神学系和哲学系听课。因为在文理中学时我只学了一点希伯来语，所以第一学期的希伯来语课把我搞得很苦。1894年2月17日，我好不容易通过了考试。只是通过以后的不断努力，克服了困难，我才比较扎实地掌握了希伯来语。

对希伯来语课的担心并没有妨碍我热情高涨地去听海因里希·尤利乌斯·霍尔茨曼的福音书比较学课：关于马太、马可和路加三福音的概论，以及威廉·文德尔班和特奥巴尔德·齐格勒的哲学史课。

从1894年4月1日起，我在第143步兵团服一年兵役。在服役时，克鲁尔上尉善解人意，他允许我尽可能在上午11点到大学去听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课。

1894年秋季，步兵团移驻霍亨费尔尔德地区进行演习，我则把希腊文的《圣经》放进了背包里。这年的冬季学期开始时，一般申请奖学金的神学院学生要通过三门考试，但服兵役者只需通过一门考试。我选择了福音书比较学。

为了能够凭自己的真实成绩在尊敬的霍尔茨曼教授那里通过考试，我在演习期间带上了希腊文的《新约》。我那时是如此的健壮，以至于根本不知道疲劳，晚上和休息日都在研读。整个夏季，我都在消化霍尔茨曼的评论。现在，我要再次仔细阅读古希腊文的三个福音书，并检验一下自己已从霍尔茨曼的评论和讲演中掌握了哪些东西。这里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霍尔茨曼有一个关于《马可福音》的假设，认为在三部福音中，它是最早写成的，其他两部福音都以它为基础。这个假设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这似乎也证明，只有依据《马可福音》才能理解耶稣的活动。但到最后，当休息日我在古根海姆村读到《马太福音》的第10章和第11章时，对于包含在这两章中的材料的涵义，引起我注意的只是由《马太福音》提供的、而不是由《马可福

音》所提供的材料。这使我感到极为吃惊。

《马太福音》的第10章叙述了12个使徒被差遣的事。在送别的讲话中，耶稣对使徒说，他们不久就会遭到残酷的迫害。但后来他们却没有发生什么事。

耶稣还向使徒宣告，在他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城市之前，人子将出现。现在可以说的只是，弥赛亚的天国就要来临了。从而，耶稣根本不期待使徒归来。

耶稣在12个使徒面前所预言的事，怎么会在后来的叙述中没有出现呢？

对此，霍尔茨曼的解释是：这不是历史上的耶稣说过的话，而是在他死后，后人对“耶稣语录”所做的汇编。但这不能使我满意。后人也不太会让耶稣说事后并未应验的预言。

从而，福音书简洁的文本只能使我认定：耶稣实际上预言了使徒受迫害以及紧接着天国人子的出现；但这些预言并没有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验证。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出现了不同于他自己预言的事，这对于耶稣意味着什么？

《马太福音》第11章叙述了施洗约翰向耶稣的提问和耶稣给他的回答。我觉得，在此霍尔茨曼也没有深入思考这段叙述的奥秘。当施洗约翰问耶稣时，施洗约翰指的是谁，他是否就是那个“将要来到者”？是否可以完全肯定，对此只能被理解为弥赛亚？根据弥赛亚的教义，先知、复活的以利亚应该先于弥赛亚的出现。为什么施洗约翰不认为耶稣就是这个先知呢？

还有，为什么耶稣不明确地答复他呢？耶稣避免做出明确的是或否的回答，因为他还不能公开承认自己是谁，这是不可想象的吗？

耶稣接着的讲话也充满了谜，在由女人生的人中，施洗约翰是最大的，但天国中最小的也比他大。自从施洗约翰以来，进入天

国也取决于努力！

这样，由于觉得霍尔茨曼对于《马太福音》第10章和第11章中材料的奥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第二学期结束时，我为他片面地把《马可福音》看作是有关耶稣生平的最重要资料的观点而深感困惑。由此，我也觉得，由霍尔茨曼代表的、并在当时得到普遍承认的关于耶稣生平的构想是可疑的。

从那时起，在不妨碍学习其他课程的同时，我就独立地、在不与别人多讨论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钻研福音书。我日益明白：期待尘世末日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支配着耶稣。

那时的斯特拉斯堡神学系开放自由。除了霍尔茨曼之外，《旧约》专家卡尔·布德是我最喜欢的神学家。我觉得他对学术成果的简洁和完整的叙述特别好。他的讲课对我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同样，教会史和教义史的两教授约翰·菲克和恩斯特·路休斯也吸引着我。当时，我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古代教义史。对于年轻的伦理学和教义学副教授埃米尔·马耶，我们大学生对他生动的讲演课评价很高。此外，当时在斯特拉斯堡神学系授课的还有威廉·诺瓦克（《旧约》）、保罗·洛布斯泰因（教义学）。弗里德里希·斯皮塔讲授实践神学和《新约》，还有尤利乌斯·斯门德。

我听雅可布斯塔尔的音乐理论课，他是贝勒曼的学生。他片面地认为只有贝多芬以前的音乐才是艺术，但人们能在他那里扎实地学到纯正的对位法。我很感激他。

1897年夏季结束时，我报名参加第一次神学考试。考试的题目是：《施莱尔马赫的圣餐理论，与新约和宗教改革文献中的观点相比较》。这是一个统一的命题，所有考生应在8周内完成，之后才能参加国家考试。

在完成这一论文之后，我开始重新探讨福音书和耶稣生平的问题。

耶稣给使徒吃由他祝圣过的面包和喝由他祝圣过的葡萄酒，并对他们说，直到在我父的国中与他们一起喝新酒之前，他将不再喝葡萄酒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也许只是说，这是他和使徒在尘世上的最后一次一起就餐，也就是说，他很快就要和他们在弥赛亚的天国中一起就餐了。从而，无论如何，对这顿晚餐应该从耶稣对尘世末日的期待出发加以解释。

1898年5月6日，我通过了第一次神学考试。接下来的整个夏天，我没有离开过斯特拉斯堡，但搬出了神学研究所，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哲学研究之中。文德尔班和齐格勒两位教授都是其专业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作为教师还很好地相互补充。文德尔班的强项是古代哲学。他的关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讨论课可以说是给我留下了大学时代的最美好回忆。齐格勒精通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他原先是图宾根的教士。作为一个原神学家，齐格勒掌握的细节知识对于他的宗教哲学教学很有益处。

根据我的考试成绩，并经霍尔茨曼教授的推荐，我获得了戈尔施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由托马斯基金会和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系共同管理的。奖学金每年1200马克，一共6年。奖学金获得者的义务是，最晚6年后要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或者退还所获得的款项。

由于特奥巴尔德·齐格勒的建议，我决定首先着手准备哲学博士论文。学期结束时的一天，在大学的教学楼前，我们在齐格勒的雨伞下又讨论了起来。他建议我以康德的宗教哲学作为题目，这也很符合我的心意。大约在10月底，我前往巴黎，在巴黎大学听哲学课，并到维多尔那里进修管风琴的演奏技艺。

但是，我并不经常到巴黎大学去，那里不自由的注册方式使我感到不快。老化的教学安排使部分还是很杰出的教学力量无法充分发挥，只能使我对巴黎大学感到扫兴。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习惯了的4至5

课时的讲演大课，那里根本没有。教授们或者举行有关考试题目的讲演，或者谈些完全特殊的东西。

在新教神学系，我有时去听教义学家路易斯·奥古斯特·萨巴蒂尔和新约专家路易斯·欧根·梅那戈茨的讲演课。我很尊敬这两位教授。

在巴黎冬季的日子里，我的精力主要花在艺术和准备博士论文上。

我在维多尔那里上管风琴课，他现在免费教我；我还在伊希多尔·菲利浦那里上钢琴课，不久之后他就任巴黎音乐学院的教师。此外，我还是弗兰茨·李斯特的天才学生和女友——玛丽·雅埃尔——特蒂特曼——的学生，她也是阿尔萨斯人。玛丽·雅埃尔短期内曾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但那时已经完全退出音乐会演奏了，从事关于钢琴指触的生理学研究。我作为她的实验动物参与了她的实验。这一实验是由她和生理学家费勒一起进行的。我多么感激这位天才的女性啊！

她的理论强调，对于手指触及琴键的方式必须要有最完全的意识。演奏者应该完全控制从肩膀直至指尖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他必须摆脱所有不由自主的和无意识的动作。追求单纯“技巧”的指法练习应该被放弃。有目的动作中的手指和所要求的乐音必须始终被想到。响亮的指触应通过尽可能快和轻的压键来实现，但也必须意识到手指让被压下去的琴键再弹起来的方式。在琴键被压下或弹起时，手指同时也处于不明显的转动之中，或者向内(拇指)、或者向外(小指)。通过在向同一面转动中被依次压下的较多的键，相应连续的乐音与和弦以管风琴的方式被组合起来。

内在的整体性产生于纯粹的次序。来自向不同面转动的乐音按其本质是相互分离的。从而，在手指和手的有意义的不同动作中共同产生出不同的乐音和分句。

为了能够日益有意识地 and 内在地触及琴键，手指必须养成对琴键的最高程度的敏感性。随着对琴键敏感性的提高，演奏者对音

色也更敏感了。

由于坚持通过对手的正确培养可以使人真正懂得音乐，玛丽·雅埃尔把关于“变得敏感和有意识的手”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理论包含许多正确的东西。从钢琴指触的生理学出发，她要把它上升为关于一般艺术本质的理论。但是，由于她经常以深奥的、更多的是过分雕琢的观察，修饰她如此正确和深入的对艺术指触的观察，以至于她的研究失去了应该得到的承认。

在玛丽·雅埃尔指导下练习，我已充分改进了我的指法。我感谢她，是她使我通过有目的的、较少耗费时间的练习日益成为我的手指的主人，这对我的管风琴演奏也是十分有益的。

菲利浦的课程是对我在玛丽·雅埃尔那里练习的宝贵补充。由于他们彼此相互轻视，因此两人都不可能知道，我也是对方的学生。我要努力的只是：上午在玛丽·雅埃尔这里弹琴，下午则在菲利浦那里弹琴！

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并没有受到艺术活动的影响，因为我充沛的精力允许我经常开夜车。每当早晨我到维多尔那里去弹管风琴时，往往在夜里就根本没有上过床。

由于法国国家图书馆阅览室笨拙的管理方式，看来难以在那里查阅有关康德的文献了。因此我干脆决定，不再与二手文献打交道，而是在直接研读康德原著的基础上写作博士论文。

通过这一研究，我觉察到康德在其术语使用上的前后不一致性。例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些有关宗教—哲学的章节中，原先认为只有它符合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智”消失了，并被比较简单的“超验”这一术语所取代。即在康德的全部著作中，其宗教哲学重要术语的意义前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我就能确定，关于《纯粹理性规则》的篇章在语言和思想上与《纯粹理性批判》没

有多大联系，它是康德的早期著作。康德把它作为宗教哲学的导论编入了《纯粹理性批判》，尽管它们之间并不一致。从而，我把康德的这一早期的、前批判时期的著作看作是他的宗教哲学纲要。

我进一步认识到，康德根本就没有贯彻其《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法的宗教哲学计划。《实践理性批判》中三个公设(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灭)的宗教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尚未形成，而在《判断力批判》和《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又被放弃了。康德晚期著作中的思想又回到了宗教哲学纲要的轨道。

对于康德的宗教哲学，人们通常要把它和三个公设的宗教哲学等同起来，其实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是由于，批判唯心主义的前提和道德律的宗教哲学要求相互对立。在他那里，批判的宗教哲学和伦理的宗教哲学各走各的路，康德试图调和并把它们组合起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法中，康德认为可以没有困难地达到这一目的，但实际上对此所提出的计划是无法贯彻的。因为，康德没有停留在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法前提的道德律概念上，而是在不断地深化它。但是，深化了的道德律观点提出了超出批判唯心主义能够承认的要求；同时，深化了的道德律宗教哲学也失去了对批判唯心主义基本要求的兴趣。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在康德由最深刻的伦理支配的宗教思想中，灵魂不灭的理念已不太重要。

没有停滞在由批判唯心主义所确定的宗教哲学上，康德本人由不断深化的道德律宗教所导引。因为它日益深化，就不能停留在原先的结论上。

1899年3月中旬，我回到了斯特拉斯堡，把已完成的论文交给了特奥巴尔德·齐格勒，他表示很满意。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将在7月底进行。

接下来的夏季，我在柏林主要研究哲学。我想阅读古代和近代的主要哲学著作。此外，我还去听阿尔道夫·冯·哈纳克、奥托·弗赖德尔、尤利乌斯·卡夫塔恩、弗里德里希·保尔森、阿尔道夫·冯·奥托、格奥尔格·西美尔的大课。

开始，我只是偶尔去听西美尔的课，后来就变得按时去听课了。

我经常去卡尔·斯图姆夫那里，他正在进行有关乐音感受的生理学实验。我按时参加由他及其助手组织的实验，就像在玛丽·雅埃尔那里一样，我又成了一个实验动物。

柏林的管风琴师，除了埃吉迪斯之外，使我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外在的精湛技巧，而不是真正的表现力。和圣苏尔皮斯和圣母教堂的管风琴相比，柏林新造的管风琴的音色是多么地低沉和单调啊！

海因里希·赖曼教授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管风琴师，通过维多尔的介绍，我认识了他。他允许我按时弹奏他的管风琴，并确定在他度假时，由我接替他的工作。通过他，我还结识了许多柏林的音乐家、画家和雕塑家。

我在恩斯特·柯蒂斯遗孀的客厅里结识了柏林的学术界。她把我作为她在科尔马任县长的侄子的朋友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在那里经常碰到赫尔曼·格林，他力图改变我认为《新约》的第四个福音与前三个福音不一致的异端观点。但是，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最幸运的是，在那里我能够与当时柏林精神生活的精英直接交往。

1899年7月下旬，我回到斯特拉斯堡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对我的论文深为满意的齐格勒教授和文德尔班教授，对我的口头答辩则有些失望。这是由于我热心于斯图姆夫的实验而没有时间准备考试，同时也由于我专注于读原著而忽略了对教科书的钻研。

当年，我的博士论文还以《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康德宗教哲学》的书名公开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共325页，图宾根摩尔出版社1899年。）

特奥巴尔德·齐格勒建议我在哲学系申请教学资格，但我决定选择神学系。因为齐格勒告诉我，人们不愿意看到我在做哲学系编外讲师的同时，又是一个布道者。然而，布道是我的内在需要。我觉得，能够在礼拜天向聚在一起的人们谈论关于生存的终极问题，真是十分美好的。

从那时起，我就留在斯特拉斯堡。尽管我已不再是学生了，但被允许作为付租金的房客住在我十分喜爱的托马斯教堂的神学研究所中。我仍住在度过幸福的大学生时代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正对着长着大树的宁静院子，是我未来工作的最合适场所。

在我的哲学博士论文的印刷校对工作还没有结束时，我就着手准备我的神学博士论文。我打算尽快获得神学博士学位，这样就可以为一位需要这一资助以完成学业的同学腾出戈尔施奖学金的名额。我急于帮助的同学是具有很高闪族语言天赋的雅格尔，但是他后来并没有使用这一奖学金。现在，雅格尔是斯特拉斯堡新教文理中学的校长。

1899年12月1日，我获得了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尼古拉教堂布道的圣职。开始，我是所谓的“实习助理牧师”；在通过第二次神学考试之后，我就成了正式的助理牧师。（我在1900年7月15日通过第二次神学考试，并于1900年9月23日在圣尼古拉教堂被授予圣职。）

在我回到神学后，首先要做的事似乎应该是继续我在第二学期就已着手的耶稣生平研究。但是，通过关于圣餐问题的考试论文的写作，我的兴趣和视野拓宽了。从关于耶稣生平问题的领域出发，我同时也从事关于原始基督教问题的研究。圣餐问题涉及这两个领域。这个问题处于耶稣信仰向原始基督教信仰发展的中心。如果我们既没有真正把握耶稣的思想世界，也没有真正把握原始基督教的思想世界，那么圣餐的产生和意义对于我们就还是一个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从中心，即从圣餐和洗礼问题出发考察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理解耶稣信仰和原始基督教信仰问题的真实情况。

基于这一考虑，我决定写一本结合耶稣生平和原始基督教史的圣餐

史。这一研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表明对至今为止的圣餐研究的看法并阐明这一问题，第二部分阐述作为理解耶稣与使徒举行圣餐的前提的耶稣思想和活动，第三部分研究原始基督教和古代基督教时代的圣餐问题。

1900年7月21日，我以第一部分的研究论文《圣餐问题》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以19世纪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报道为基础的圣餐问题》，共62页，图宾根摩尔出版社1901年。）第二部分的研究《受难秘密和弥塞亚秘密——耶稣生平纲要》，1902年我把它用作在大学获得授课资格的论文。（《受难秘密和弥塞亚秘密——耶稣生平纲要》，共109页，图宾根摩尔出版社1901年。英文版为：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1914, Dodd, New York; 1925 A. & C. Black, London）。

我也研究了圣餐在原始基督教和古代基督教时代的发展，并就此内容以及它的相应研究“新约和原始基督教中的洗礼史”进行了讲演。这两部分的研究没有出版。因为开始我只想将耶稣生平研究史作为耶稣生平纲要的附录，但后来却成了一本大书，使我费去许多精力。接着来了一个插曲——写一本关于巴赫的书。这本书的最初设想同样也只是一篇论文。再后来则是学医。在学医结束，当我又有时间从事神学研究时，我觉得应该写一本关于保罗思想世界的学术研究史，以作为耶稣生平研究史的参照和阐述保罗理论的导论。根据对耶稣和保罗理论的新的理解，我打算在第一次赴非洲行医约两年之后，写一本关于圣餐和洗礼的产生和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发展史。但是，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打乱了我的计划。在不是原先的两年而是四年半之后，我被（法国当局——译者）遣送回欧洲。我当时患病，并必须谋生。而在那时，又一个新的插曲，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开始了。

在关于圣餐问题的神学博士论文中，我努力证明：没有关于重复由耶稣发出的命令的假设，圣餐也必然在第一个教区中出现。确实，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对圣餐的报道中，并没有重复命令。